

# 贵州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的模件化生产

张 嫣<sup>1</sup>, 邹 游<sup>\*2</sup>

(1. 北京服装学院 美术学院, 北京 100029; 2.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采用雷德侯的模件理论方法,从思维、图式构成和批量生产3个角度,对苗族服饰中的模件化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得出,贵州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在创造思维上具有关联性和互换性的特征;在图式构成上分为一体式和分体式2种。其上衣的后领和前门襟堆绣图案具有对称性,前门襟织带具有秩序性,双肩和衣袖的刺绣图案具有身份性;制作过程中,盛装上衣的剪纸技术、刺绣技术、染制技术和裁剪技术都可以通过模件化生产。研究表明,通过模件理论来理解传统苗族服饰,能够帮助找到其服饰支系传承延续的关键法则和创新路径。

**关键词:**苗族服饰;盛装上衣;模件化;图式构成;批量生产

**中图分类号:**TS 941.74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4)02-0175-08

## Modular Production of Miao Women's Attire Tops in Shidong Guizhou

ZHANG Yan<sup>1</sup>, ZOU You<sup>\*2</sup>

(1. Academy of Fine Arts,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2. School of Fash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d the modular theory method of Lothar Ledderose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modular characteristics in Miao costum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inking, pattern composition and mass prod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ttire tops of Miao women in Shidong Guizhou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of correlation and interchangeability in creative thinking,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forms of one-piece and split in terms of pattern composition. The embroidered patterns on the back collar and front placket of the tops are symmetry, the woven straps on the front placket show certain rules, and the embroidered patterns on the shoulders and sleeves are with identity. Dur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paper cuttings technology, embroidery technology, dyeing technology and cutting technology of the attire tops can all be produced through modularization.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Miao costume through the module theory can help us identify key principles and innovative path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costume lineage.

**Key words:** Miao costume, attire tops, modularization, pattern composition, mass production

传统民族服饰的有序传承与活化创新一直是传统服饰传承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传承的前提是熟知,知古才能迭新。目前国内外关于贵州台江地区女子盛装上衣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大多聚焦于服饰形制结构、图案内涵和技术工艺等某一单项问题,如对施洞苗族女装剪裁方式和结构特点的分析<sup>[1-2]</sup>,通过剪纸、叠绣等技法对图案展现过程中蕴

藏的文化内涵的探讨<sup>[3-4]</sup>,以及对破线绣<sup>[5-6]</sup>、堆绣<sup>[7]</sup>等刺绣工艺的制作材料和程序的考察记录。

但对于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图案的来源,不同位置图案所代表的独特含义,服饰间的图案是否可以相互替换,替换后对支系之间身份认定的影响,生产制作技术是否有批量化的可能等关键性问题,还未有串联性的研究。基于此,文中将施洞苗

收稿日期:2023-07-10; 修订日期:2023-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20ZD10);北京市学科建设-国家特殊需求-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人才培养项目(NHFZ20230012)。

作者简介:张 嫣(1988—),女,博士研究生。

\* 通信作者:邹 游(1971—),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创新与管理。Email:2304318089@qq.com

族女子盛装上衣作为研究主体,试图从创作思维、图式构成和批量生产 3 个方面,系统地探寻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的内在逻辑和规则,找到传统苗族服饰代际传承的重要“密码”,为后续的创新设计提供思路。

# 1 贵州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模件化生产的前提

## 1.1 模件化生产的基本概念

雷德侯在《万物》中将构成系统分为“元素”“模件”“单元”“序列”和“总集”5 个部分,在汉字领域,其分别指向“笔画”“部首”“单字”“文本”和“汉字”5 个方面,而在建筑领域,则指向“斗拱”“开间”“建筑”“院落”和“城市”<sup>[8]</sup>。

表 1 苗族图案、苗族服饰与汉字对应的模件系统

Tab.1 Module system corresponding to Miao pattern, Miao costume and Chinese character

领域	元素	模件	单元	序列	总集
汉字	单独的笔画	构件或成分	单独的汉字	连贯的文本	所有的汉字
苗族图案	装饰线条	单个图形	单个图案	整体图案	图案谱系
苗族服装	单个图形	局部图案	单件服装	支系服饰	苗族服饰

不同地域苗族服饰的模件体系拥有其各自的构成逻辑,这也是“百苗百衣”背景下各支系服饰仍然得以传承延续的关键。

## 1.2 贵州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的模件化思维

施洞地区的苗族服饰制作精美,图案变化丰富,银饰款式繁多。盛装女上衣的基本元素为单个图形,并由单个图形组成模件式的局部图案;其设计的思维也是一种模件化的思维<sup>[9]</sup>,主要有以下两种思维逻辑。

**1.2.1 关联性思维** 关联性思维强调类推,“它的出现是基于一种随意的类推过程,这种过程以联系与区别为前提”,而这种联系“产生于人类对其周围环境发出的有意味的反应”<sup>[10]</sup>。苗族服饰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服饰图案大多记录了苗族的迁徙历史与传说故事,此时服装就如同自己过往的家园土地,而服装上的图案则是对当时美好家园中万物的记载<sup>[11]</sup>。施洞地区苗族女子盛装上衣中的图案均指代了具体的事物,具有引申意义。例如,上衣是对祖先老宅的立体记载;后衣领和前门襟上有一对约 3 cm×11 cm 的堆菱图案,代表着苗族祖先家中窗户的两个隔扇;衣袖中横向具象图形与纵向抽象图形的三段式组合图案代表了房屋的廊柱;一体式的四方连续几何图案代表着屋顶的藻井;以人与动物的具象组合纹样为主的多段式图案代表屋

模件是可以互换的构件<sup>[8]</sup>,在文字中用不同笔画组合书写出来;在青铜器中表现为装饰图案、铸造技术,也可通过单个器具在礼制中的重复排序来体现。模件体系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制作、木质建筑构建、纸质印刷等多个领域均有运用,其生产逻辑为先拆分再组合,即人为将一个人造物拆分成各个单元,先完成单元内的制作,再将各单元复制、组合。在模件化生产过程中,也遵循着其固有的法则,“由高度标准化的可互换模件构成单元,新模件尺寸比例与旧模件类似,尺寸要求也无需绝对精准,因此单元内的新旧模件都可以通过复制进行生产。”<sup>[8]</sup>将这一逻辑放在苗族服饰中也同样适用,借此,能找到不同支系苗族服饰的重要符码构成,同时找到其民族审美的独特性。苗族图案、苗族服饰与汉字对应的模件系统见表 1。

檐下的雕花横额;两肩部竖向的条纹图案代表房屋的屋檐;衣片上的斗纹图案则是家门口石阶的缩影。

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图案通过“记忆—语言—图案”的转换,让建筑和服装关联起来,从而使人的身体与生活的土地产生联系。承载家园的山川土地和孕育生命的女性身体都是族群繁衍生息的基础,服饰图案被赋予了“家园”的信息,这也是其后续演变的根基;穿着服装的人被拟物化了,身体成了“家园”的载体。过节时苗族女子穿着盛装聚集在一起,呈环形或十字交叉,如同在古老城市中向四周发散或纵横交错排列的一幢幢老屋,展现了苗族人民经过多次迁徙后在我国西南的土地上重新聚集的盛况。

**1.2.2 互换性思维** 模件化的创造主要在于模件之间的互换。汉字通过不同偏旁部首的组合产生截然不容的意蕴,施洞地区苗族女子服饰图案中也经常会出现这种互换情况。这些图案在成为服饰前,是被拆分开来的单独个体,在市场上供需售卖,因此一件服装的图案模件常拥有多个来源,两件衣服

的模件也能相互替换。

施洞地区女子盛装上衣图案的互换性主要体现在两处:①单件服装中前门襟和后领上的一对图案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两组图案为风格类似的系列图案,但前后位置之间并没有既定的规则;②同一

件服装领口和肩袖图案位置是固定的,但两件衣服同一位置处的图案可以互换。这种具有互换性的模件化生产方式,造成了施洞女子上衣图案的“惯例性”模糊,即所有服装都遵循既定的图案布局规律,但各个部位图案的使用没有明确规定。人们在区分服装时,可以根据模件化的规则分辨各支系的服装,但如果是两姐妹间的上衣就没有那么容易分辨。这种互换性为施洞地区传统女子盛装上衣的传承提供了条件。一个苗女并不需要会制作整件衣裳,她只要了解其服饰图案的构成逻辑,就可以通过购买单独模件,组合成一件完整的衣裳。同样,她们也并不意味着袖子上的图案是“久保杀龙”还是“合磨成婚”,后领上的图案到底是万字几何纹还是双鱼并対纹,只需知道这些图案都是对美好家园的记录和对古歌的记载即可。

## 2 贵州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的标准化图式构成

受关联性和互换性两种模件化思维的影响,贵州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具有一体式 and 分体式两种图式构成形式。

### 2.1 一体式

一体式施洞苗族女子上衣的两袖图案为一个整体,其图案主要分为人与动物一体式、几何图形一体式和几何动物一体式 3 大类(见图 1)。人与动物一体式图案的主题多为苗族古歌故事,这些图案将人物和动物相结合,以平视式构图形式为主,并用横线分为 2~3 个部分,按故事发展的顺序从上到下排列;几何图形一体式的图案以四方连续的排列方式为主,排列形态近似井字天花,意为祖先家中的藻井,图案则多为几何纹或几何变形的植物纹样;几何动物一体式中的动物纹也多来自苗族古歌中为苗人繁衍生息作出贡献的“有功之臣”,如为人类偷来谷物种子的天狗,将姜央兄妹从崖底救出的岩鹰等,它们的形态被抽象化,并以四方连续的形式排列出来。



图 1 一体式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

Fig. 1 One-piece Miao women's attire tops in Shidong

### 2.2 分体式

分体式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的两袖图案被分为多个部分,其图案主要有几何动物分体式和人 与动物分体式 2 类(见图 2)。几何动物分体式中,两袖图案被分为 3 段,上下 2 段为相似的横向动物纹样,中间 1 段则为纵向的几何纹样,一般 2~3 个纵向几何图形依次交替排列构成 1 组,总共有 4 组,象征着祖先家中顶立四方的立柱;人与动物分体式中,两袖图案被横向分为 3 组长条形的小块,图案为平视式构图,内容以蝴蝶妈妈生下 12 个蛋、姜央兄妹合磨成婚等古歌故事为主。



图 2 分体式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

Fig. 2 Split Miao women's attire tops in Shidong

## 3 贵州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批量生产的模件化体系

贵州施洞地区苗族女子盛装上衣的模件化装

饰主要分为后领和前门襟的堆绣、门襟的织带、双肩与双袖上的绣花 3 个部分,其标准图案形态为:①前门襟和后领有一对 3 cm × 11 cm 左右的套组形图案,其主题、色彩与工艺手段相同,图案内容有细微差异;②门襟用宽度 0.5 ~ 2.5 cm 的几何形织带缉边,多则使用 3 条织带,少则 1 条;③双肩上有 3 组图案,平展服装时,横向为 2 组(上部的 1 组为 4 cm × 15 cm 的竖条几何纹,下部的 1 组为 6 cm ×

15 cm 的具象人与动物图案),纵向为 1 组(8 cm × 20 cm 的图案,且与下部横向图案的主题相同),每组图案左右对称;④双袖图案为 22 cm × 26 cm 左右的对称图案,涵盖抽象几何图形、具象人与动物等类型,具体因穿着主体的身份而有所差异。施洞地区苗族女子盛装上衣由多个可以互换的单元组成,这些单元构成了一个标准的模件化生产系统(见图 3)。



图 3 贵州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的模件系统  
Fig. 3 Modular system of Miao women's attire tops in Shidong Guizhou

### 3.1 模件化生产的装饰体系

施洞地区苗族女子盛装上衣拥有其独属的“装饰母题库”<sup>[8]</sup>,其中既包含抽象的几何图形,也有具象的人与动物图案(见表 2)。

施洞地区女子盛装上衣不同部位的图案因其装饰手法及图案类型的差异,体现以下 3 个特征。

**3.1.1 衣后领和前门襟堆绣图案的对称性** 在施洞地区口口相传的古歌故事中,衣后领和前门襟图案象征着苗族祖先家中窗户的两个隔扇,两两相对。衣后领和前门襟的堆绣是可更换的单独模件,其对称性表现为:①衣后领或前门襟的单个堆绣图案轴对称或中心对称,图案多为几何纹,有菱形万字纹(1 个或 3 个为 1 组),也有单独的双鱼纹,或双鱼与万字相组合的纹样;②衣后领和前门襟两个堆绣图案的材料、工艺与颜色配比相同,相互对称;③衣后领和前门襟两个堆绣图案的图形近似但不完全相同,具有关联性与系列感。

**3.1.2 前门襟织带的秩序性** 秩序性是指服饰在设计时所遵循的一致性、确定性和连续性。施洞地区女子盛装上衣的前门襟织带装饰就遵循了秩序性原则。①在颜色上,民族服饰的色彩通常追求艳丽感,显得浓郁厚重。服饰有主色调,再加上一点色彩鲜艳的花边或头巾,平添几分情趣<sup>[12]</sup>。织带的颜色与上衣图案的整体颜色相同,色彩比例也基本

一致。②在装饰形式上,织带以上衣后中为分界,遵循着左右不对称、一长一短的秩序,有堆绣图案的一边比没有图案的一边长 35 ~ 40 cm,围绕堆绣图案形成“U”形装饰。

**3.1.3 双肩和衣袖刺绣图案的身份性** 施洞地区女子盛装上衣双肩和衣袖部分的刺绣,是判定其服饰穿着者身份的重要依据。

从刺绣工艺上看,施洞地区女子盛装上衣双肩和衣袖图案刺绣均为平绣,女童服饰绣线不用破开,成年女子服饰绣线会被破开几份或十几份。从图案的颜色上看,女童上衣双肩和衣袖的刺绣主体色为中红色或蓝色;成年女性中,未婚者服饰刺绣图案的主体色为红色,已婚者的主体色则为蓝色。从图案类型上看,女童和成年女性的双肩图案均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为彩色竖条纹,下部为具象的人与动物图案。女童的衣袖装饰为一体式绣片,绣片的图案类型有具象的人与动物、四方连续的抽象几何图形以及几何与动物。此处的具象图案没有白色线条钩边,虽然有横线区分画面,但实际并未分割,仍是在同一块绣布上。成年女子上衣的衣袖图案为分体式,由 3 段图案组成,未婚女子衣袖图案以具象的人与动物为主,且图案在画面上有白色线条钩边;已婚女子衣袖图案除人与动物外,还有抽象几何与具象动物的组合,组合图案中的几何图形均为竖向的条形纹(见表 3)。



表 2 施洞地区女子盛装上衣图式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women's attire tops in Shidong

部位	一体式			分体式	
	人与动物	几何图形	几何动物	几何动物	人与动物
后衣领中					
前门襟					
门襟					
双肩 (横向)					
双肩 (纵向)					
双袖					



表 3 施洞地区女子盛装上衣衣袖图案类型  
Tab.3 Pattern types of sleeves on women's attire tops in Shidong

类别	图案类型	刺绣工艺	颜色
女童	人与动物一体式	不破线	红色,蓝色
	几何图形一体式		
	几何动物一体式		
成年女子(未婚)	人与动物分体式	破线	红色
成年女子(已婚)	人与动物分体式	破线	蓝色
	几何动物分体式		

3.2 模件化生产的技术体系

从纺线到制成一件服装,施洞地区女子盛装上衣的制作工序可以先拆分成几个部分,再有序组合,每个部分的单独工序都可以模件化生产。这种先分后合的服装制作技艺,其本质就是一种模件化生产的技术体系。

3.2.1 剪纸技术 施洞苗族破线绣常用剪纸作为底图,除了个别纹样可以直接绘制于底布,大多纹样都需要先做成剪纸图样<sup>[6]</sup>。破线绣的剪纸图样以套为单位,成组制作和销售,如肩膀及两袖的破线绣剪纸均成对出现。在进行服装制作时,绣娘们会根据衣服的形制,设定好各部分图样的大小和数量,再开始图样的剪制工作。在商业集市中,也有成套售卖的剪纸花样,购买一整套剪纸就可以依此绣制出完整的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图案。

剪纸环节不再是“一人始终式”,剪纸花样的制作成了模件化的,可以拆分给多个不同的人制作完成。甚至随着现代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人工手绘的剪纸变为机器复印,再逐渐被机械化的“拍摄—彩印—激光切割”过程所取代。在施洞的集市摊位上就同时出现了 3 种形式的纸制图样(见图 4)。



(b) 复印的破线绣剪纸图样



(c) 拍摄的破线绣剪纸图样



(a) 手绘的破线绣剪纸图样

图 4 手绘、复印与拍摄的破线绣剪纸图样

Fig.4 Hand-drawn, copied and photographed broken thread embroidery paper cutting patterns

3.2.2 刺绣技术 施洞地区苗族女子盛装上衣的

刺绣主要包含破线绣和堆绣两种。破线绣需先改变线型再进行刺绣。制作前,先将丝线分破成4~16股,再将打过结的线用针多次穿过事先准备好的皂角浆糊小包中,使线成为更顺畅、更有光泽的破线,而后依次逐针刺绣<sup>[5]</sup>。破线绣的绣花图样需要3层:第1层为硬度较高的底衬,通常使用上浆纸;第2层是用土布或丝绸等柔软的天然布料制作的面布;第3层为剪纸图样。刺绣时,将3层图样用皂角或浆糊固定,再将破开的丝线穿过包裹有泡发皂角浆的塑料袋,从底布进针,围着剪纸的边缘上下往返绕线运针,最终将剪纸样完全包裹住,完成刺绣。

堆绣是将各色丝绸小方块折成三角形后,根据纹饰图案叠放在一起,通过排列组合形成各式立体图案的传统工艺<sup>[7]</sup>。堆绣同样运用模件化的方式绣制,三角形的丝绸小块是最基础的模件,通过摆放位置和颜色组合搭配成既定的图案。

**3.2.3 染制技术** 施洞地区女子盛装服饰使用的面料是苗族极具特色的手工面料——亮布,其制作过程为浸染—晾晒—捶布—蒸制,这既是模件化的程序,也体现了苗族族群的共同文化记忆<sup>[13]</sup>。

制作亮布时,需先将白色的坯布浸在蓝靛、米酒和草木灰混合的染料中,放置一段时间后捞出晾晒干,蓝靛染料浸染—晾晒的流程循环3次。在第4次时,将布料放入高压锅内,和切成小块的牛皮一起炖煮,晾干后再进行捶布。接着将虎杖树(根部)、薯蓣(块茎)、金樱子(根部)等植物混合熬制成棕红色,熬成的汁水过滤后涂抹于布上,晾晒后捶布。棕红色染料浸染—晾晒—捶布的过程也是重复3次。最后,将完成7次晾晒—捶布的布料放进甑子,在甑子底部放置干稻草、红辣椒、芭茅草、红鸡冠花等植物蒸制,使布料最终呈现出暗红色哑光状态<sup>[14]</sup>。

**3.2.4 裁剪技术** 施洞地区苗族女子上衣在裁剪过程中,也有其模件化的用料及数量要求。在用料上,施洞地区用于制作苗族女子上衣的布料主要分为平纹、小斗纹和中斗纹。一般而言,女上衣前片使用小斗纹,后背使用中斗纹,如果特别清贫的人家则是上衣前片使用平纹,后片使用小斗纹。后背使用的纹样等级或图案均高于前胸,具有逐步提升的意喻。在裁剪上,施洞苗族女子盛装上衣沿袭了中国传统服装形制中的十字形服装结构,即以前、后身中心线为纵轴,以肩袖线为水平轴,前后片直线连裁<sup>[2]</sup>。施洞苗族女子上衣在布料使用量上也有定数,以身尺为单位,一尺布料宽度为织布机的幅宽(约30 cm),长度则以穿着者的手为标准,两扎

为一尺(约33 cm)。成年女子衣服多用料13尺(约429 cm),其中后片用料4尺(约132 cm),前片用料5尺(约165 cm),两袖各用2尺(约66 cm)。基于此,其后衣长为2尺(约66 cm),前衣长为2.5尺(约82.5 cm),袖长为1尺(约33 cm)。

施洞地区女子盛装上衣的生产采用模件化体系,将单独工序标准化复制,再借由“拆分—组合—整体”的“多人共建”模式,使服饰生产批量化成为可能。

## 4 结 语

贵州施洞地区苗族女子盛装上衣的生产运用了关联和互换的创造思维,遵循着模件化的图式组合规则与逻辑,其图案的组成过程既有一定的自由度,又会被一些规则和惯例所限定。通过标准有序的模件化生产技术,可以实现苗族服饰的大规模复制,这既是民族服饰传承延续的关键法则,也是后续设计创新的重要基点。基于此,传统民族服饰文化的研究者和设计师可以从苗族服饰的图式“母题”中,找到连接传统文化内涵和现代设计审美的通道;同时也能在传统手作技艺的标准下,提取契合工业化生产的关键因素,在注重产品品质的同时,利用模件化复制的优势,找到传统苗族服饰延续与传承的途径。

## 参考文献:

- [1] 邹璐. 基于传统造物精神的施洞苗族女装结构与工艺的文化解析[J]. 服饰导刊, 2019, 8(3): 14-19.  
ZOU Lu.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and craft of the women's costume of Shidong Miao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reation spirit[J]. Fashion Guide, 2019, 8(3): 14-19. (in Chinese)
- [2] 赵明. 直线裁剪与双重性结构——中国少数民族服装结构研究[J]. 装饰, 2012(1): 110-112.  
ZHAO Ming. Line cutting and doublet structure: a study of Chinese ethnic costume's structure[J]. Zhuangshi, 2012(1): 110-112. (in Chinese)
- [3] 侯小春. 发生认识论视角下施洞苗族剪纸造型叙事结构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7(4): 158-163.  
HOU Xiaochun. A study 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paper cutting of Miao ethnic group in Shid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tic epistemology[J].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47(4): 158-163. (in Chinese)
- [4] 周莹. 节用与重复: 贵州施洞苗族叠绣矛盾性造物智

- 慧研究[J]. 装饰, 2022(9): 109-114.
- ZHOU Ying. Thrift and repetition: research on contradictory making wisdom of fold embroiders of Guizhou Shidong Miao ethnic group[J]. Zhuangshi, 2022(9): 109-114. (in Chinese)
- [5] 张春娥, 杨坚, 曾磊. 贵州省台江县苗族破线绣文化探究[J]. 丝绸, 2016, 53(10): 70-76.
- ZHANG Chun'e, YANG Jian, ZENG Lei. Investigation on the art of Miao split line stitch in Taijiang Country of Guizhou[J]. Journal of Silk, 2016, 53(10): 70-76. (in Chinese)
- [6] 张爽爽. 台江苗族破线绣的制作工艺[J]. 民艺, 2019(4): 93-96.
- ZHANG Shuangshuang. The thread-splitting embroidery craft of Miao nationality in Taijiang[J]. Folk Art, 2019(4): 93-96. (in Chinese)
- [7] 陈晓英. 民族共同体意识下贵州苗族堆绣艺术及其应用发展[J]. 贵州民族研究, 2021, 42(2): 108-112.
- CHEN Xiaoying. Guizhou Miao's pile embroidery art and its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community[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21, 42(2): 108-112. (in Chinese)
- [8] 雷德侯. 万物: 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M]. 张总, 钟晓青, 陈芳, 等译. 党晟, 校. 3 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 [9] 周梦, 王超群. 贵州黄平苗族女性盛装上衣装饰艺术研究[J]. 丝绸, 2023, 60(8): 122-132.
- ZHOU Meng, WANG Chaoqun. Research on the decorative art of Huangping Miao women's splendid attire tops in Guizhou[J]. Journal of Silk, 2023, 60(8): 122-132. (in Chinese)
- [10] 安乐哲. 和而不同: 中西哲学的会通[M]. 温海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1] 周莹, 吴济池, 许靖熙, 等. 贵州苗族叠穿对女性身体的“再设计”[J]. 丝绸, 2023, 60(7): 91-99.
- ZHOU Ying, WU Jichi, XU Jingxi, et al. "Redesign" of women's body by layering of Miao people in Guizhou[J]. Journal of Silk, 2023, 60(7): 91-99. (in Chinese)
- [12] 何桃. 民族服饰装饰艺术中的秩序感——以插画设计为例[J]. 印染, 2023, 49(1): 94-95.
- HE Tao. Sense of order in the decorative art of national costume—taking illustration design as an example[J]. China Dyeing and Finishing, 2023, 49(1): 94-95. (in Chinese)
- [13] 王建华, 桂亚昕, 李鹏辉. 苗族蜡染文化元素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1, 28(7): 41-45.
- WANG Jianhua, GUI Yaxin, LI Penghui. The application of Miao batik cultural elements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2021, 28(7): 41-45. (in Chinese)
- [14] 胡瑞波, 董建辉, 杜沂倩. 从艺术人类学角度来谈方南苗族亮布工艺中的智慧嬗变[J]. 贵州民族研究, 2022, 43(6): 151-155.
- HU Ruibo, DONG Jianhui, DU Yiqian. Research on the wisdom evolution of bright cloth process in Fangnan Mia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anthropology[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22, 43(6): 151-155. (in Chinese)

(责任编辑: 沈天琦)